

聚焦新时代新闻学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姚晓丹 王晓真

7月6—7日,“新中国70年:新闻学发展经验与成就”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历程和经验,以及在新时代如何继续推动新闻学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概况。他表示,新中国70年光辉历程中,逐步建立起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形成了具有全球视野、高科技、现代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新闻学学术不断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体系。其中,新闻传播史研究整体成果丰硕。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新闻史研究推动新闻学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推动着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获奖著作越来越多,学术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能力大为增强;中国新闻史学会发挥了积极组织服务作用。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文庭荣认为,与西方理论相比,中国新闻学理论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学界也经常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这种提法便于进行本体意义的追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提法有目标系、参照系、价值体系,对于同西方进行交流,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也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杜骏飞提出,70年来,大众传媒语境中的“人文主义”三大概念,其内涵分布是偏向的、不平衡的,是随历史发展和意识形态潮流而变迁的。

与时俱进的新闻学和新闻媒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认为,为了建立新闻学基本理论体系,理清新闻学的学术源流、人脉源流和代表性理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有历史的眼光,认真厘清新闻学的源流。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进行深入挖掘,让新闻传播学成为广博而精深的学科。二是要有时代的眼光和精神。人类的新闻活动日新月异,我们必须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媒介形态、传播主体、传收主体关系的结构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时代眼光也要以世界眼光为境界。三是要有跨学科的观念和精神。当前的许多问题涉及高度融合的、与多个学科领域相关的因素,要透彻研究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新闻学是不够的,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交融。四是要有建构体系的观念和能力。

文庭荣表示,新闻媒体具有宣传组织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其中,宣传功能是一个很重要、基本的功能。媒体的这一功能需要深化,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核心是新型和主流,主流不仅是指要成为喉舌,还要能够推动整个社会、人民群众和国家不断进步。要能够推动不同的阶层、对象有新的发展。学界对媒体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研究已经有所深化。媒体社会功能正在成为媒体经济功能的基础和来源之一。

技术发展推动媒体融合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表示,叙事有三个层面,某一事件、人物等的本身是本事,围绕本事件会有不同的表述,也就是不同的述本出现。多种述本集合起来就会形成底本。在互联网语境下底本、述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述本会推动底本发生变化,二者又共同推动本事再继续变化,进而推动社会的演变。传播不仅形成舆论而且形成了改变和推动事件本身的力量。在互联网上,好的述本会被符号化,外在形式生动,含义丰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赵云泽在介绍技术上的媒介传播模式革命时表示,传统媒体的大众媒体传播模式会强制选择作为受众的“人”进行捆绑销售。新兴媒体传播模式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传播模式,形成了以“人”为主体进行生产、分享、把关的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周勇提出,大众文化正向“视觉”转向,图像传播的普适性使其能够跨越“认知鸿沟”。他表示,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给媒体带来巨大的变化。传统电视“转瞬即逝”的线性传播方式决定了其是一种主要以“时间”为资源的媒介。而在新媒体异军突起的今天,互联网的介入使电视传播向“虚拟空间”进一步延伸,“时间”资源之于电视的重要意义也因在线视频、互动点播等新技术的涌现不断被消解。可以说,新媒体环境下电视传播逻辑正在经历一场“时空”的革命,是从“时间”思维向“空间”思维的转变,即时间的线性让位于空间的非线性,时间资源的有限性让位于空间的无限性。

周勇认为,未来视听传播发展会呈现新技术的结构化影响,多种社会力量的形塑、面向不同场景的生产与传播以及产业链的丰富等特征。而对视听传播的研究则需把握好产业与政策、实践、应用三个面向,这些研究的核心在于重塑新媒体的视听传播基础理论体系。

创新助力传统媒体转型

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副总编辑蒋安全以《环球时报》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媒体近30年来的创新转型。他提出,《环球时报》如今多元共生的媒体格局既是适应媒体融合迭代、效能转换的要求,也是迎合当下中国社会不同目标受众群体的要求,更它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伟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要求。正是准确把握住了这些时代要求,《环球时报》才一步步发展成为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



在谈到新闻从业者应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大环境时,赵云泽认为,要乐观地迎接媒介技术再一次的革命及其带来的繁荣。文庭荣认为,新闻从业人员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对新闻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要求新闻理论研究工作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要进行理论调适,在理论创新和价值重建上做更多的努力。

谈及电视版权市场买方垄断研究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辉锋引用实例介绍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市场的买卖供需状况,说明这其中存在着供需不平衡、价格难衡量、交易欠保障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建议,一要增大供给弹性,二要进行价格规制,三要成立版权保护组织,以期打造更健康的电视剧市场业态。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吕薇洲表示,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是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新闻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列为11个需要加快完善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肩负着“为高质量成果、高水平人才搭建一流平台”神圣职责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近年来对新闻传播学给予了高度重视,希望能将新闻传播学前沿论坛办成品牌论坛,与学界专家一起,携手推进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新研究

构建社会治理法学体系

本报武汉7月7日电(记者明海英)7月6—7日,第五届法治社会·长江(国际)论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法学学科体系研究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认为,构建社会治理法学之首要任务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方向标,从基层创造的、可复制的社会治理新鲜经验的智慧库,区域社会治理的经验库,域外发达国家治理立法技术的参照系等方面,进行创新性发展,凝练为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继承性与民族性的标识性概念,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表示,构建社会治理法学“三大体系”需要从三个方面实施体系创新。第一,升级转型传统学科。法学理论、法律史、民法、刑法、宪法

等传统学科,在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智识资源,持续不断地为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但相较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创新,不少传统学科也出现了智识隔绝、知识老化、方法陈旧等问题,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动这些传统学科的升级与改造。第二,发展新兴学科。社会发展和法律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需求,需要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发展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学学科体系,如创建立法学、检察学、审判学、司法管理学、综合执法学、法律监督学、法治评估学等。第三,支持交叉学科。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不是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方法可以独立解决的,需要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参与,需要文理工多学科协同。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法学会杂志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

动态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孙美娟)6月30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9京津冀蓝皮书“打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信息发布会在京举行。

“要更好地发挥天津的中枢作用,唱响新时代‘双城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提出,要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叶林堂认为,京津冀三地虽然在协同发展目标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在跨界生态、跨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

与承接等方面缺乏紧密的合作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会议发布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9)》称,实现京津冀创新驱动需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并重,打破区域行政界限和管理机制条块分割,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从要素集聚与共享、主体融合与合作创新、创新成果高校产出、成果产业与技术交易、创新环境优化等方面,实现三地的整合和对接,打造由三地创新系统、产业链以及创新资源互动、有机连接而形成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会议

提升统计方法的科学性

本报广州7月7日电(记者武勇)7月6日,由《统计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共同发起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在广州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由经济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发展所带来的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研究新趋势等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许宪春表示,经济社会统计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要实现创新发展,以适应新时代、反映新情况、满足新需求,在服务宏观决策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以及促进经济学、社

会学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经济社会统计理论、方法和标准都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经济社会统计学者要创新研究领域,实现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对接。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博采众家之长,加强与经济学、社会学、数理统计、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升经济社会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论坛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平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计量经济学研究平台承办。

简报

本报武汉7月1日电(记者明海英)6月30日,《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与国家印象研究报告(2017—2018)》成果发布暨寰球民意与战略传播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

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海华认为,公众观念调查对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具有重要作用。报告展现了中美两国公众对重要问题上看法上的差异,对于我们处理两国关系很有价值。

本报敦煌7月7日电(记者朱羿)7月5—7日,“敦煌(DH2019)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学术年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提出了敦煌数字化的构想,运用高科技手段为敦煌壁画、泥塑、洞窟分别建立了数字档案,为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数字敦煌”已成为一套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和管理技术体系和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昆表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也越来越期望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充分了解中美两国公众文化交流现状和对彼此国家的认知印象,不仅有利于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作出前瞻性预判,还可为应对全球治理挑战和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提供宝贵借鉴。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表示,分享来自各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及数字人文领域最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对探索未来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方式,推动文化、文物遗产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让大众在可视、可听、可感、可触的境况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会议由敦煌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观察

整体把握我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

本报广州7月5日电(记者李永杰)近日,“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新中国70年”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阐述了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他认为,“走出去”的文化,应该是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民族的文化、现代的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我们要关注世界文化的需求,贴近当地生活实际,创新文化推广的方式、方法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龚云表示,要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里程碑。要从整体性的角度把握70年来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即把70年来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与世界变局紧密结合起来。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双印认为,回顾和总结70年来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可以更好地推进今后思想文化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深圳大学主办。



7月7日,“年华易老,技·忆永存——第二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优秀成果推介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图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冀中笙管乐”(子位吹歌)表演。 本报记者 吕家佐/摄

关注

深刻认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探索

本报上海7月7日电(记者查建国 夏立)7月6日,由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探索青年学者论坛”在沪举行。

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上海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解超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劲的生机和活力。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当代青年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青年学者应有的担当。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士海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探索,守正的根本点体现在人民立场,这

是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拓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以贯之的不变立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而逐步深化和不断发展的。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勇表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特殊的时空境遇,某些社会、某些民族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可

以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拓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主题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睿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历史性、民族性、世界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好社会主义提供了生动有力的历史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开创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